

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与特征

任保平

摘要: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以自然哲学为其方法论基础,以符合自然秩序的“利己心”为出发点建立了其经济学理论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在其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方法论内容上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方法论思维范式上的历史维度与社会维度,思考因素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重性特征,这种方法论特征对其后世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的演变起到了很大作用。总结其方法论基础和方法论特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方法论 二重性 经济学体系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发表被称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即对重商主义的革命),《国富论》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由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研究了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使经济学开始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因此,在《国富论》中文版刊行100周年之际,研究《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和方法论特征对理解《国富论》的经济思想以及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方法特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奠定了其现代经济学的祖师地位,但由于斯密本人曾是道德哲学教授,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作为哲学著作来构思与完成的,他“侧重于运用哲学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即经济哲学的研究”,在其《国富论》中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学派的影响,以自然学派的“自然秩序”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构建了《国富论》的理论体系。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这部巨著的经济思想,就必须首先理解其方法论基础。

自然哲学是斯密所处时代的一个主要的哲学思想流派。这种哲学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的斯多亚派,这一学派承认自然的客观性,“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组织、有系统、不断运动的活生生的东西。”这一学派认为“人人皆为自然之子,皆秉有一份自然宇宙中的小宇宙,是大宇宙神圣火焰飞溅出来的一朵火花”,而且认为人性的自然不在于感性,而在于理性,这一理性要求人类要依自然而生活,依道德而生活,在经济生活中人类要隶属于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是反自然的,而道德秩序是符合自然的,因而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循道德法则,专注于伦理的关怀。这一思想后来经过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阐发,形成了新的形态,对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然哲学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比人创造的秩序优越的多,体现着一种合理性,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一哲学思想首先影响到了经济学上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笃信自然法则,认为在“自然秩序

中,亦即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和谐的个人主义才能达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在真实世界的现实秩序中,个体力量的自由较量极可能受挫,并伴随由经济冲突而不是由经济和谐所导致缺点的出现。”当现实秩序偏离自然秩序时,自然秩序的有益效果便不能充分地显现。由于“重农学说对亚当·斯密发生了很大影响”,斯密便在其《国富论》中以自然哲学中的自然秩序作为自己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来探索经济运动过程的规律。在《国富论》中体现的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又合乎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秩序,“他所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因而利己主义是合乎“自然秩序”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只有他自己关心个人的私利。他认为人是利己主义者,这是人的本性,因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到处讲利己主义,讲个人利益。按照这种逻辑,既然个人利益是从人的本性产生的,所以他是合法的,每个人的利益只受到他个人利益的限制。《国富论》的这一方法论基础“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即相信自然界有牛顿式的秩序”。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之上,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由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六种动机所推动。因此,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政府的作用不完全是守夜人,政府的作用是为了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从这一方法论基础出发,斯密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且他认为利己心符合自然秩序,是人的天性,是自然所赋予的,“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便成为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该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斯密认为符合人类利益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是符合自然秩序原理的。反之,违背人类利益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不是适应自然发展的,是不符合“自然秩序”原理的。基于这种认识,斯密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自然法则意味着限制国家的作用,符合个人自由的利益。”基于这种认识,斯密在经济上

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是自然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自由竞争,旁观者的监督,自然的调和,是有益于国家繁荣的自由。”^⑧

斯密将“利己心”看成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认为符合“自然秩序”的这种利己心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且是一国交换活动产生的基础。由于“利己心”的存在,这样从别人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就需要给予别人所需要的东西。同时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人作为利己主义者,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人们互相帮助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交换,既然交换是从人的本性产生的,所以它也是自然的现象,从交换又引出了分工。这样分工、交换、价值、货币等经济现象便应运而生了。在符合“自然秩序”的“利己心”的推动之下人们进行各种劳动,从而劳动成为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逻辑地得出增加劳动数量,提高劳动质量,就成为了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并且把劳动质量提高所形成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看成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⑨。

虽然“斯密”以“自然秩序”作为《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把“利己心”看作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但是他又认为在“利己心”驱使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是冲突的,反而是一致的。因为个人需要比较多,不能完全通过自身的经济活动来直接满足,需要与他人发生交换,在与他人交换中又需要去考虑他人的利益。因为社会是由许多人构成的,社会利益也是由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这样又形成了《国富论》方法论上的原则:分析社会和社会整体利益应当以分析个人、个人本性和个人利益为基础。由于社会是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的一切现象是各个人活动的结果,这样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经受着一只看不见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标”^⑩。在这一点上,斯密的思想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特点,“斯密,和那个时代许多别的哲学家一样,假定存在着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自然同一。如果每个人都关心他自己的利益,社会就会得到最好的服务,这是一条很适合人意的信念。”^⑪

总体来看,斯密以自然哲学为其方法论的基础,把符合“自然秩序”原则的“利己心”作为出发点,在《国富论》中认为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最终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这一思想认识不仅体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正如巴克豪斯所指出的,“说到底,古典经济学没有李嘉图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没有亚当·斯密和《国富论》,古典经济学便不可理解了。”^⑫

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特征

对于斯密《国富论》方法论特征的研究,不论是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还是经济哲学的研究,都着重强调其方法论内容

的二重性: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其实《国富论》的方法论特征除了内容的二重性而外,还有思维范式的二重性:历史性维度与社会性维度。思考因素的二重性: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把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完全理解《国富论》方法论的二重性特征:

1. 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

从其方法论基础出发,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的研究中首先形成了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一方面采取抽象法来研究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抽象法又叫逻辑抽象法,这一方法在使用时先挑出一系列主要的起始范畴,把它们相互依赖的根本关系联系起来,进而分析更加复杂和具体的社会现象。在《国富论》中,斯密把工农业统一起来考察,通过抽象分析,寻找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一些本质因素——价值,初步形成了劳动价值理论,“他从价值概念出发,形成了工资、利润、地租、资本、分工、交换、生产、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等一系列概念。”^⑬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斯密的抽象法是初步的,是存在缺陷的抽象法,“表现为他重分析而轻综合,定义概念不完善,有时不能揭示其本质,对概念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全面。”^⑭另一方面,又采取现象描述法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外部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做深入具体的分析。使用经济学的术语、概念、统计数字、数学公式对经济现象的表面现象进行分析,把表面现象的联系看成是最终的本质结论。例如在价值分析中,他运用抽象法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用劳动对价值做了规定。但是他用其劳动价值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时却运用了现象描述法,他所提出的“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就把“产品和工人的生活资料或工资的表面联系说成是价值的来源。”

这种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贯穿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始终,这种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是由其研究任务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他以自然秩序作为方法论基础,力求把经济知识纳入《国富论》体系,一方面分析其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还要描写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表现。这种研究任务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他既用抽象法探索各种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又用描述法论述各种经济因素变化的现象,他的双重任务决定了其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⑯

2. 方法论思维范式的二重性:历史性维度与社会性维度

在《国富论》的研究方法中,在方法论的内容上斯密表现出了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的二重性,而且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了历史性维度的思维方式与社会性维度思维方式的二重性。斯密在阐述其经济学原理的部分中主要采取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但在某些部分的研究中也使用了“历史性”的思考方法,针对《国富论》中是否有历史性维度思维范式的争论,唐正东先生指出“以我之见,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有‘历史的’,他不但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对当代市民社会进行了探讨,而且把经济的线索放到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中,

提出了经济因素与政治和道德因素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思想。”^⑩但是“历史”在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中必然只是一种思想前奏,而不可能与其他经济理论溶为一体,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⑪但无论怎样,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的确使用了历史性的思维范式。在第三篇中研究了历史上的各种经济政策,说明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的背景。在第一章中研究财富的自然发展时,运用历史分析方法举例分析了财富在获得发展之前的各种状态。在第二章中同样运用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研究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碍。在第三章又用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研究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城市的勃兴与进步。第四篇讲述了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经济学流派,指出它们在各个时代和各国家中新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站在历史分析的维度上,从经济线索、政治的政权形式和司法形式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展开了对财产的发展与政权形式发展关系的论述。

在《国富论》中,斯密除从历史性维度的思维范式上来分析经济问题,而且在历史维度的思维中运用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问题,在研究中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性思维范式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斯密的道德观本身就是对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性的研究,‘社会’在斯密那里,既不是简单的直观唯物主义所认同的那种孤伶伶的个人的机械组合,也不是法国或德国的主要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种先验性的人性内涵之反映,而是由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构建而成的。可以说斯密是站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那一时代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刻画。”^⑫也就是说在《国富论》中,斯密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维度方面来思考经济问题的,而且在《国富论》中,这一研究方面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分工与交换两个方面来展开其社会性的思维范式的。在第一篇的第一章论分工中,斯密一开始就把“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归结为“分工”的结果,然后为了说明“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他从“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开始讨论,分析了分工的好处及其形成原因。并由分工的讨论又引入交换,他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要的物品,他能与之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要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⑬由此可见,在斯密的《国富论》中,由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性思维范式展开了《国富论》的思想体系,并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了当时以交换为内容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同时他还正确把握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每一个人都在尽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由于“社会”是由这些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构成,因而他认为对个人利益的直接追求就是对社会利益的间接促进。

总体来看,《国富论》的思维范式具有历史性维度与社会

性维度两重思维范式。但他重点以社会性维度为主体,把经济学层面上单个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哲学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联系,把社会看成是个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国富论》思想分析的视点,使其经济学思想中的“社会”完全达到了彻底的经验主义,经验性的交换关系是斯密经济学中“社会”的全部内容。在此基础上又运用历史维度的思维范式,把社会性思维范式与历史性思维范式相联系,较好地处理了静态的原理性分析(社会维度)与动态的历史性阐述(历史维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国富论》思维范式的二重性。

3. 方法论因素的二重性: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国富论》方法论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方法论内容的二重性、思维范式的二重性,而且在方法论所涉及的因素方面也具有二重性。也就是说《国富论》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是从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方面来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这一经济问题的。

《国富论》一开始是从国民财富及其形成的原因等问题入手,采取抽象法建立了《国富论》分析问题的基本概念,诸如价值、分工、交换、货币等,进而研究财富的性质、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他在《国富论》中是以经济因素为主体来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但事实上,他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并没有脱离非经济因素。在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研究中涉及到了经济因素与政权形式、司法形式发展等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政府在保障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大众安全和维持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三方面的职能,同时还论述了社会分工、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在方法论上从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二重因素来研究经济关系。

这种关注非经济因素的方法论特征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家方法论的普遍特征,在古典经济学时代,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政治学家,他们的著作中既有经济学思想,又有哲学思想和政治学思想,这种总体综合分析的方法显示出了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因此柳欣博士指出:“在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最初阶段,曾经经历过一个哲学时代,那些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们面对混沌的世界提出了大胆的猜想和假说,他们集今天分离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为一体,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总体论的认识揭开了研究自然规律的序幕。经过多少代人的探索,当人们把这种总体论认识分离为各个学科的微观世界加以研究之后,越发感到了古代思想家们这种总体论认识的具大意义。”^⑭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相类比的话,作为经济学最初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正是经济学的哲学时代。^⑮这种研究方法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都一直延续着,在他们的著作中体现着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对非经济因素的深切关怀。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日益脱离非经济因素,走向了“纯化”的地步,他们借助于高深的代数、严密的统计和精确的计算建立了经济模型,但是在这些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都是纯经济的,见不着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变量,

特别是与经济变量密切相关关系的政治变量^⑭,从而导致了经济学脱离现实的悲哀。

三、亚当·斯密《国富论》方法论对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演变的影响

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在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国富论》的方法论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形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系统形式。另一方面它承前启后,为后来经济学的方法论开启了先河,对其后世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形成了重大影响。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的二重性,引起了其后世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的分化。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之下,经济学方法与经济思想逐渐形成了两大理论流派。

一派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他们逐步完善了斯密的抽象法。斯密虽然第一个使用了抽象法,但他的抽象法本身是具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是他虽然注意了分析,但却对综合注意不够,往往把一个概念按不同的因素单独规定几个定义,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⑮此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继承并坚持了抽象法,并发现了斯密方法论的矛盾,批判了其现象描述的方法,他们沿着斯密抽象法的思路,对抽象法的系统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对斯密二重方法论的矛盾和抽象法的缺陷也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上运用了抽象法,把抽象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抽象法更加完美并系统化,形成了科学抽象法。“也正是在马克思的手上,斯密那里初级形态的抽象法,经过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的中介,得到成熟。”^⑯马克思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实现了各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以概念运动为主体,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使斯密在《国富论》中有缺陷的抽象法完成了向科学抽象法的转变。马克思之后,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列宁等都充分地运用了科学抽象法,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探讨。从而形成了经济学方法与经济思想理论的一大流派。

另一大派别是从马尔萨斯、萨伊开始到今天为止的西方经济学,他们继续和发展了现象描述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全面运用了现象描述法,并借助过数学工具使其不断现代化。他们抛弃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使用的抽象法,而又继续发展了现象描述法,他们否认抽象法的作用,强调现象描述法的重要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形成了系统,把现象描述法发挥到了极致。萨伊抛弃了斯密的抽象法,片面强调现象材料的归纳,把表面现象看成是本质规定,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是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抽去了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强调物与物的关系。萨伊之后的詹姆士·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尔、约翰·穆勒、巴师夏又进一步发展了现象描述法。以戈森、门格尔、庞巴维克和马歇尔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以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在方法论上都是现象描述法的进一步延伸,此后的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各经济流派接受了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新的工具发展和运用了现象描述法,最终形成了经济思想成长过程中的另一个方法论和思想理论流派。

四、研究亚当·斯密《国富论》方法论基础的现实意义

《国富论》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顶峰。1902年我国出版了严复的译本,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植根与发展。因此,研究《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和特征对中国经济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从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理性与哲学理性并不是息交绝游的关系,经济理性概念的发展客观离不开哲学的‘支援意识’的影响和作用。”^⑰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之中往往受到哲学思想的牵引,显示了哲学思想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虽然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建立起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具有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却使经济理论直接面对了经济现实。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建立了公理化的经济学逻辑体系,但这种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却抽象掉了经济现实中的重要因素。“一旦把它扩展到对现实的解释,就会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⑱因此哲学不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牵引力,而且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思维的武器。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在经济理论上取得创造性的突破,不改革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行的,而要进行方法的改革,就需要重视对经济学的哲学的研究。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产生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因为任何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时空特征,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哲学理念和世界观的支配。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要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

2. 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斯密的《国富论》是将伦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他将早年所从事的伦理学与哲学思想融合到经济问题的研究,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国富论》,不仅推动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现今的经济生活和当代的经济研究仍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在理解斯密思想时,重视了其经济思想的研究,但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被忽略了。“如果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主张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⑲伦理学属于哲学的范畴,因而它具有方法论的功能,为经济学家方法论基础的确立和方法论的价值判断的导向提供着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信用的缺乏,社会心理的失衡,价值判断的缺位又进一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为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诸如“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相容问题”、“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问题”、(下转第95页)

3. 张锡营、刘念怀:《中国实施资产证券化跨国运作的探讨》,载《金融研究》,2000(4)。

4. 张世荣、张绍岩:《中国资产证券化外向型发展模式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6)。

5. 何小锋、来有为:《中国离岸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探索》,载《世界经济》,2000(9)。

6. 顾保国:《加入WTO与我国企业海外上市分析》,载《亚太经济》,2001(2)。

7. 林毅夫:《新世纪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载《中国投资》,2001(2)。

8. 戴国强、孙奉军:《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离岸运作》,载《上海金融》,2001(8)。

9. [英]克特·卡尔、拉扎:《未来应收款项的证券化: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有用的工具》,载《国际贸易译丛》,2001(4);原载《金融与发展》,2001(3)。

10. 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主编:《中国金融理论前沿》,见何德旭:《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应用前景及对策》,296~34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95-2001),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2001。

12. 中国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00-2001),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001。

13. 郭树清:《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载《金融研究》,2002(2)。

14. 巴特·卡尔亚、泽摩尔亚:《资产证券化:前景和问题》,艾尔温·普罗巴斯出版公司,1989。

15. Bhattacharya A. K., 1996. Asset-backed Securities, Frank J. Fabozz Association New Hope, Pennsylvania.

16. Duff & Phelps Rating Co., 1995. Asset-Backed News, September.

17.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1995. A Historical Review of Ratings Changes in the Public Asset-Backed Securities Market, 1986-1995, October 20.

18. Standard & Poor, 1997. Structured Finance Ratings Asset-Backed Securities-Trade Receivable Criteria, April.

19. Standard & Poor, 1997. Securi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pril.

20. Thompson, J. K., 1995. Securitisati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ECD Publications.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金融学系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N)

(上接第84页)“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等。这样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在经济研究中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

3. 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研究的影响。从内容上来看,斯密的《国富论》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旁及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乃至法学、文学等领域。从方法论来看,他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如哈奇森所指出的:“斯密的社会哲学传统是通过社会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继承下来的。社会学家们一直生动地持着斯密道德哲学的充满活力的火花”。^⑩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制约相当大,因而要使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很好地指导现实,就必须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既要研究那些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又要重视文化、道德、历史传统、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增强研究成果的可行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

注释:

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24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册),2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中文版,160、1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文版,66、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季陶达:《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5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2。

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74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

⑩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⑪⑫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上卷,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⑬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下卷,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⑭[英]索利:《英国哲学史》,中文版,19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⑮转引自朱国宏:《经济社会学》,4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⑯⑰⑱董瑞华、傅尔基:《经济学方法论》,32、32、36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⑳㉑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19、19、4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㉒㉓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6、2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㉔叶江:《经济学的悲哀》,载《读书》,1999(10)。

㉕㉖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58、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㉗张雄:《一个新的研究视点:经济学的哲学传统》,载《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9(3)。

㉘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文版,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㉙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文版,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西安 710062)
(责任编辑:S)